

【历史】

“报闻”与“不报”： 从《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

蔡明伦，蔡 伟

(湖北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奏疏留中现象在明万历朝尤为突出，成为影响时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万历邸钞》作为明末人整理的当代史料，对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多有著录。邸钞中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和内容选择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朝政治变动及党争等政局。神宗对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取舍，彰显了皇权对舆论的控制，皇帝虽然怠政，但从未放权。万历中后期围绕奏疏留中所进行的控制与抗争，反映了万历朝的君臣冲突及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独立意识，这种意识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渊源关系。

关键词：明万历朝；《万历邸钞》；奏疏留中；皇权；启蒙思潮

中图分类号：K 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6-0064-05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4.06.010

奏疏留中是明万历朝政治的一种突出现象，它反映的是神宗在不能阻止官僚士大夫上疏言事时，通过消极地不合作来控制章奏的发抄，从而达到利用皇权抵制士大夫们依托道统对皇帝实行政治制衡的目的。章奏的留中，反映在邸报中，就是神宗在奏疏上特别批示的“不报”。以邸报为中心的研究，是新闻史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①；对于章奏留中的研究，学者也有关注^②，但将这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尚付之阙如。本文拟通过对邸报中两个具有明显控制舆论倾向的词语的解读，来解析万历朝的章奏留中现象，即通过排检作为明代邸报代表的《万历邸钞》所载神宗御览奏疏时所批示的“报闻”与“不报”，分析之所以会出现“报闻”与“不报”的差异性缘由，对由“报闻”和“不报”所体现的万历政局和皇权制衡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解读神宗和晚明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并以此探求明末“非君”启蒙思潮的源流。

一、《万历邸钞》中“报闻”与“不报”现象概观

《万历邸钞》从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到四十五年六月(一部分年度阙如)，抄录与重要事件有关的邸报并加以整理，基本覆盖了万历时代的历史，是

和《明实录》相补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明代社会状况极为重要。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中考证：“《万历邸钞》三十二册……万历元年至十一年。又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又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又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每年酌钞数条，朱笔俱明人点勘，并非全录。”^[1](P77)]《万历邸钞》虽然经过了编辑和删削，但原件和加工的界限分明，并不影响对邸报原件的判读和研究，其真实性应是确凿无疑的^[2]。

(一)奏疏“报闻”与“不报”在年代和数量上的分布差异

虽然经过删减，“并非全录”，《万历邸钞》记载的连贯性仍非常清晰。但批过“报闻”与“不报”的章奏在时间上则具有明显的间断性，其在不同年代的数量分布也大不相同(参见表1)。

总的来看，奏疏“不报”的数量为“报闻”数量的三倍有余。在时间分布上，“不报”的奏疏具有明显的间断性和集中性。万历十六年第一次出现“不报”，但直到万历二十年，章奏“不报”的数量才开始大幅增长，并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高位。万历三十七年之后“不报”的数量开始明显减少。

收稿日期：2014-07-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BZS02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3d093)

作者简介：蔡明伦(1971-)，男，湖北仙桃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明史研究。

表1 《万历邸钞》历年“报闻”与“不报”数量之统计表
(单位:次)

时间	报闻	不报	时间	报闻	不报
万历元年	1	0	万历二十六年	0	3
万历二年	1	0	万历二十七年	1	11
万历十年	2	0	万历三十年	1	0
万历十一年	1	0	万历三十三年	1	6
万历十二年	1	0	万历三十四年	2	14
万历十六年	1	1	万历三十五年	5	7
万历十七年	1	0	万历三十六年	2	12
万历十八年	1	0	万历三十七年	1	5
万历二十年	2	2	万历三十八年	2	1
万历二十一年	2	4	万历三十九年	3	3
万历二十二年	1	7	万历四十一年	1	0
万历二十三年	0	8	万历四十三年	0	1
万历二十四年	1	15	万历四十四年	1	0
万历二十五年	0	15	共 计	35	115

注:表中缺失的年份并非邸钞未录年份,而是因当年未有“报闻”或“不报”的章奏在录,所以略去该年之统计。本表及本文其他表的史料依据均为《万历邸钞》,下文各表不再说明史料来源。

(二)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内容差异

从内容来看,“报闻”和“不报”的奏疏差异显著。就“报闻”而言(参见表2),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

表2 《万历邸钞》所载“报闻”之奏疏分类统计表

奏疏内容	建言陈事	官员求罢	奏进图书	攻讦纠举	请勘代藩	考选科道	其他	共计
报闻件数	11	2	2	5	2	2	11	35

表3 《万历邸钞》所载“不报”之奏疏分类统计表

奏疏内容	事关东宫册立、预教、婚礼	大臣辞归求罢	荐举官员	申救罪臣	反对矿监税使	进谏陈言	官员之间参劾攻讦	批评时政、指斥皇帝	其他	共计
不报件数	6	13	6	3	10	26	25	19	7	115

注:此表统计奏疏有交叉之处,如一奏疏既是官员之间参劾攻讦,又含有批评时政之意,则表中对两种内容都计算在内。

二、奏疏留中与万历朝政局

万历朝奏疏的“报闻”与“不报”,与万历朝政局的演变息息相关,奏疏留中在时段、数量分布和内容选择上的特点,与万历政局阶段性的变化相表里。

(一)万历二十年之前,奏疏留中甚少,政局大体平稳。从表1可以看到,万历二十年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奏疏“不报”的现象,这是由于在此阶段的前十年中,神宗年幼,张居正辅政,以铁腕的政策,厉行改革。其大力的整顿,使官僚队伍的素质和官僚机构的效率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4](P247)},朝廷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5](卷二一三《张居正传》,P5645)}。在张居正死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初操政柄的神宗也曾有过励精图治的愿望和表现,尽管继任的申时行等“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5](卷二一八《申时行传》,P5749)},

等朝中重臣以及各衙门所上有关实政的奏疏多予“报闻”;太监、巡抚所上奏疏也会“报闻”;另外,像宣捷、皇元子诞生、封爵等国家喜事也是要“报闻”的。批示“报闻”的奏疏虽然覆盖面很广,且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但“报闻”与“不报”并不全然因人而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事而定的。如兵部尚书李化龙在万历三十七年正月上了两份奏疏,一份奏陈边防任将等事,得以“报闻”;一份请发内帑五十万两,“不报”^{[3](P1704,1709)}。

与“请发内帑”之奏被留中“不报”相类似,神宗批示“不报”的奏疏,其事项和数量见表3。

神宗“不报”的奏疏集中在有关官员进谏陈言、参劾攻讦、批评时政等方面,事关反对矿监税使和大臣辞归求罢的,也有一定的数量。这些都反映了神宗对该方面的奏疏具有明显的排斥心理。这些奏疏的作者,以言官居多。一般大学士的奏疏神宗是不会留中的,但是内阁大学士若是上疏辞归求罢,神宗则不予发报。如万历三十九年李廷机一百二十余疏求罢,不报^{[3](P1875)}。

但神宗对于自己的工作还算尽心尽力,政事处理较为流畅,故而章奏极少留中“不报”,政局大体平稳。

这二十年间,唯一一次出现的奏疏“不报”,是在万历十六年八月“李材,刘天棒论死”条下附录。因“虚报捷级,饰诈冒功,扶同罔上,欺侮朝廷”,李、刘二人被论罪处死,此时刑科都给事中唐尧钦上言希望万历皇帝“记人之功,忘人之过”,法外开恩,以使边臣感奋。神宗无视这种申救,对此疏批示“不报”^{[3](P414)}。万历十六年,是神宗亲政的前期,尚不乏英才之气,被张居正压制的权力欲也还处在释放的阶段。对此“不报”之事的处理,显示出神宗在处理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见,既非庸主^{[6](P213)},也非消极怠政。

(二)万历中后期,受神宗怠政、阁臣软熟与党争等因素影响,奏疏留中集中,明代政局淆乱。从万历

十六年开始第一次出现“不报”的奏疏,到万历二十年之后“不报”的奏疏越来越多,尤其是万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三十四、三十六年“不报”的奏疏共67件,占所统计不报总数(115件)的58%。这种现象首先和神宗怠政有关。万历二十年,御史冯从吾指责神宗“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5](卷二四三《冯从吾传》)}。万历二十四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在极谏时政阙失时指出:“尔来殿廷希御,上下不交”,“君臣相猜,政事积废”^{[5](卷二三五《张养蒙传》)},批评神宗深居不出造成朝政危殆。万历三十九年,御史马孟祯也揭露神宗“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5](卷二三〇《马孟祯传》)}。批评者言辞激烈,但神宗对章奏照样置之不理。“自上倦勤,内外章奏悉留中不发”^{[7](卷七四,神宗万历三十八年)}。“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5](卷二三七《田大益传》)},以极端消极的态度对待言者。

万历二十年后奏疏留中现象突出,还与这一时期阁臣整体素质下降有关。张居正死后,神宗为了避免再出现张居正那样“威权震主”的阁臣,有意识地挑选一些“软熟”之人充当阁臣,如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人,“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5](卷二一八,“赞”)};张四维、许国、赵志皋、张位、朱赆等人,柔媚取容,持禄自固^{[8](P72, P73)},只知唯唯诺诺,任由神宗本人随意处置奏章,破坏规制。当神宗逐渐失去初操政柄的英气与活力,且缺乏阁臣有力的辅佐与匡正,大量奏疏留中“不报”便成为万历中后期政局的常态了。

奏疏留中现象也与万历中期的党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至万历三十九年的辛亥京察,其间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的争斗愈演愈烈,朋党之争已逐渐由暗争发展为明斗。翻检《万历邸钞》中的“报闻”与“不报”,不难发现这种党争的痕迹。这十几年间,不论是“不报”的奏疏,还是邸钞本身的著录,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取向性,如万历二十七年的邸钞多录各地矿监进银内库之事,同年言官之疏多有不报(据前文表1有11件),清议受阻;而万历二十八年邸钞的言论明显地倾向东林党,同年言官的奏疏附录很多,甚至参劾矿监的奏疏也有摘录^{[3](P1151~1212)}。表3中所列因“官员之间参劾攻讦”而“不报”的奏疏大都集中在这一时段。直到辛亥京察之后,随着东林党暂时在朝廷中处于优势地位,“不报”的奏疏才逐渐减少。这种奏疏“报闻”或者“不报”的取舍,以及奏疏“不报”在数量上的波动,是党争背景下混乱政局的直观反映。

(三)万历三十七年之后叶向高秉政,章奏“不报”减少,万历政局稍稳。万历三十七年之后“不报”的奏疏开始明显减少,并持续处于低位,而“报闻”的奏疏基本每年都会有,这种现象与叶向高的艰难支撑有关。从万历三十七年起,内阁的实际职权归于叶向高一人之手。叶向高作为以清流自居的东林党元老,执掌内阁期间行事虽力求稳妥,却也敢于与怠政的皇帝进行抗争,同时竭力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党争,意欲扭转颓政,有所建树。故在他实际秉政的五年时间里,政局有短暂的改观。这种局面反映在《万历邸钞》中,就是“不报”的章奏数量减少,“报闻”的章奏则能稳定的保持。

三、“报闻”与“不报”:皇权的主动控制

对于奏疏“报闻”或者“不报”,神宗是有其自己的想法的。总的来看,有关天象、军事、钱粮以及大学士和矿监税使所上的奏疏,基本都会批“报闻”;而对于言及册立,弹劾矿监税使,请发内帑,官员之间互相攻讦,言官指摘皇帝私事,特别是直谏之臣直批龙鳞的,则一般都会批示“不报”。从对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取舍,可以明显看出皇权的意志所施加的巨大乃至绝对性的影响。

以神宗对有关天变奏疏的批示为例。受“天人感应”神学影响,历代王朝都非常注重与“天”的沟通,一俟天象有变,钦天监、言官等便都会大发议论,或言天变示警,或言天降祥瑞等。有关天变的奏疏在《万历邸钞》中出现很多,批示“报闻”或“不报”的至少有三处。如万历十年夏四月,彗星见西方,南京御史于有年上疏认为天变示警,其应主兵。报闻;万历二十年三月,陕西天鼓鸣,巡抚叶梦熊奏称从来无此非常之变,而且多也。报闻;万历二十二年六月,西华门灾,吏科林材等疏言变不虚生,内劾多名官员,认为灾异出现“是必有匪人不宜在君侧者”,不报^{[3](P127, 659~660, 839~842)}。一般官员对于天象天变的议论,神宗是允许的,但对于某些官员利用自然界的怪异现象,通过附会来为其政治斗争或派系斗争服务,神宗则果断批了“不报”,将此疏留中不发,防止在官员中激起更大规模的互相攻讦。可见,神宗虽然怠于临朝,但是始终控制着局面^{[6](P363)},对于官员在做什么,想做什么,而自己应该做什么,他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决断的。

神宗对于册立之事的批示亦可印证这一点。在国本之争中,对于大臣小臣、内监外藩,凡是上疏请求早立长子的奏章,神宗一概留中不报,包括职司册

立之礼的礼部尚书和作为藩王的山阴王的奏请也是如此。但有一个例外,即锦衣卫指挥郑国泰的奏请却被明示“报闻”^[3](P538),这很难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从中可明显地看出神宗欲盖弥彰之意,因为郑国泰乃郑贵妃之弟。精明的神宗皇帝为了不使郑贵妃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便特意对其弟请立长子的奏疏予以“报闻”,以缓外廷所施加的压力。

另外,神宗留中奏疏,也表达出对士大夫群体的厌薄心理^[9]。《万历邸钞》中几乎所有官员参劾性质的奏疏都只是“附录”,不然则旁批“不报”。晚明时期,大臣之间聚党争斗,此消彼长,章奏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邸报便日益成为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进行攻讦倾轧的政治斗争工具^[2]。然而神宗对各党派之间互相攻讦的奏疏却不置可否,不论曲直,一概留中。“厌臣下之屡聒”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认识到廷臣攻讦的动机所在,不希望党争之风扩散,恐怕才是神宗留中“不报”这些奏疏的关键所在。故而在神宗对奏疏消极留中的表象背后,是皇权对朝政的主动掌控。

四、留中与抗争:“非君”思潮的涌动

通观整部《万历邸钞》不难发现,奏疏的大量、长期“不报”对官员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许多官员因其上疏建言被无情的留中“不报”,心灰意懒,决意求去。但是他们求罢的辞疏同样被留中不报,这就引起了朝政的混乱。曾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说:“今章疏频留而不下,内阁不得拟票,外庭无由禀承,省决殆少疎焉。原其初,偶以圣意未协,间一留览耳。后来停阁之多,寝以稽滞,事关黜陟刑赏而留,纲纽为之渐弛矣。”^[10](奏疏卷一《请御朝讲发章疏疏》, P487) 朝臣参政治国“所恃以通下情者,只章疏耳”,今一切束之高阁,以致一些正直官员痛苦地发出“言路惟空存议论,世道何如哉”^[5](卷二二六《王元翰传》)的浩叹。为此,朝臣特别是言官展开了规模较大的谏诤抗争。

据董其昌编《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所收录的留中奏疏数量之统计,神宗留中言官的奏疏最多。《汇要》共收录奏疏 301 件,其中言官奏疏 160 件,包括六科给事中奏疏 71 件和御史奏疏 89 件^[11]。这种情况在《万历邸钞》中也有同样的反映,梳理《万历邸钞》所载神宗对言官陈言时事之疏的处置,仅万历初年有所报闻。在清算张居正尤其申时行致仕之后,神宗对言官奏疏厌恶有加,虽然这些奏疏内容多关切时事,直陈时弊,但神宗常以其言辞激聒为由,将其奏疏留中“不报”。正如万历三十五年工科右给事

中王元翰所言:“数年以来,台谏封事一切留中,如以石投水者。”^[12](卷十三《时务》,王元翰:《时事百弊,天听转高,遂痛苦流血以沥愚恳疏》, P567)

一方面是神宗对于言官的厌恶和打压,对其陈言时事的奏疏多留中“不报”;另一方面,言官们无视被留中的奏疏,继续不断地上疏。留中奏疏既为神宗之怠政,而群臣攻之无虑,疏之无尽,虽为时政言论宽松态势之表现^[13],同时也显示出明代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原则意识及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士大夫们认为“成规”、“旧制”是其实现政治权力的必要环节,必须遵守。而神宗留中奏疏不报的行为与“旨从中出”相似,是有违政治常规的,是不合理的做法。皇帝留中奏疏不报,这使得士大夫的议政权大打折扣,君臣一体的理想政治模式由此受到冲击,官员群体与皇帝个人之间的主要联系被切断。因此,士大夫群体(主要是言官群体)抗议神宗“不报”奏疏的首要政治诉求,在于要求皇帝回到依托士大夫主导政治的道路上来,要求皇帝在运用皇权的过程中尊重士大夫的政治参与权,做到从谏如流。士大夫群体在抗议神宗留中奏疏的过程中,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道统、祖制、成规之上,体现出强烈的“从道不从君”的意识,带有启蒙意义的“非君”思潮亦由此而生^[14]。这也体现出士大夫群体企图依托传统政治文化对君主的绝对专制有所约束,从而突出秩序、规则的作用,这也昭显了晚明时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理性主义色彩^[9]。

这种理性主义反映在君臣关系上,尤其是万历朝的君臣关系上,就是君臣尖锐对立的深刻现实。“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15](《原君》, P9),而万历中后期朝臣竟然在奏疏中直接对皇帝本人进行所谓“净谏”的攻击。固然神宗本人的德行确与古圣王相去甚远,需要规劝,但是上此类奏疏的官员却因神宗留中不报他们的奏疏而产生意气之争,对神宗过失的劝谏态度更加强硬而激烈,完全不为尊者讳。这种现象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万历朝深刻的君臣冲突,反映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正是其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私,反对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倡导天下为主,君臣平等共治的思想。

五、结语

万历前期大臣上书陈事建言,多以“报闻”,显示出当权者对于广开言路、开放舆论的渴望以及当时行政部门的正常化运转。到了万历中期,“报闻”与

“不报”交错其间,表明邸报对具体时政刊之与否,要受到皇帝的严格限制和时局的多方掣肘。通过排检“报闻”和“不报”的具体章奏内容,可以看出官方尤其是皇帝对控制上情有选择地下达所表现出的强烈欲望。万历后期,即便是在言路不畅、章奏十之有九被留中不报的时候,官员尤其是言官依然不断上疏,或陈言时弊,表明心迹,或规劝皇帝,讲解道理,当然也有大量的官员由于党争等原因互相攻讦,毫无休

止之意,以致万历皇帝“厌臣下之屡聒,一切度之禁中,屡催不下”^[16](卷三《章奏留中》,P67)。这种对奏疏留中“不报”的现象,反映出君臣冲突中君主的些许无奈,说明士大夫政治事实上弱化了君主权利的个人专断色彩^[9],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文官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其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皇帝、皇权的制约。这种独立性的思想在明末清初进一步发展,就成为顾、黄、王“非君”启蒙思潮的先导。

注 释:

- ① 对中国古代“邸报”的研究,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发端,后来又有姚福申、方汉奇、尹韵公等学者的研究,最近的还有安徽大学孔正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官报——邸报史”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新闻史方向,较少挖掘邸报本身的史料意义。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大量以邸报为原始史料依据进行论述;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三章论述东林党的形成过程时也认为在“明代的万历时代史,尤其东林党问题的研究上,《万历邸钞》和《万历疏钞》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并在该章的论述中大量以《万历邸钞》为史料依据。
- ② 关于奏疏留中的研究,孟森认为留中制度酿成亡国之祸(孟森

撰,商传导读:《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邓之诚撰《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序》、薛瀛伯撰《神庙留中奏疏汇要跋》,两文以介绍《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一书为主旨,兼及讨论神宗朝“留中”史事,两文皆载于《史学年报》1937年第2卷第4期。曹国庆在《万历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对留中有所叙述。另外,台湾谢渠源所著《明代忠烈奏议论衡》(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探讨了奏表留中的利弊;近期李佳发表在《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上的《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对奏疏留中做了一定的探讨,该文是以《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为中心的考察,而本文的考察中心则是《万历邸钞》中的“报闻”与“不报”。本文参考了上述研究成果,间有引述,并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 尹韵公.略论《万历邸钞》[J].新闻与传播研究,1989(1).
- [3] 万历邸钞[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 [4] 王天有,高寿仙.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M].台北:三民书局,2008.
- [5]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樊树志.万历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7] 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张治安.明代内阁制度之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 [9] 李佳.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J].古代文明,2009(4).
- [10] 王家屏.王文端公集[A].四库全书存目本(集部第14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1] 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A].续修四库全书(第47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2] 吴亮.万历疏钞[A].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3] 商传.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J].学习与探索,2008(5).
- [14] 蔡明伦.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J].史学月刊,2006(4).
- [1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1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Selection of the news and events for publicity on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Ming dynasty

CAI Ming-lun, CAI Wei

(School of History,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2, China)

Abstract: Official reports are optionally reserved during the Wanli era in Ming dynasty,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chronology. It is assumed that the selection of news and events for publicity speaks for the political disturbance and conflicts among parties. The emperor makes point of controlling the media to the effect that he is frequently languid, but he never bequeaths powers to lower levels. This has more or less resulted in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Wanli era of Ming dynasty; selection of reports for publicity; imperial power;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程 慧]